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1.014

论朱德区域产业发展思想与实践 ——基于“南泥湾政策”的实践考察

王安平, 勒格木果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摘要: 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革命战争时期, 朱德非常重视通过产业发展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边区产业建设中, 他提出并指导实践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 推动了边区多元产业和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他基于边区革命与建设需要, 在探索边区产业发展之道中, 形成了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和市场导向为内容的区域产业发展思想。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朱德; 区域产业发展; 思想与实践; 南泥湾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65; F127.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3)01-0087-06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Zhude Region: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Nanniwan Policy"

WANG Anping, LEGE Mugu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Zhu D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throug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border area, he proposed and guid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ous "Nanniwan Policy", which promo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industries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in the border area. Based on the needs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he explored the wa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formed the idea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people-oriented, diversified coordination and market orientation. These valuable experience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Zhu De;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anniwan Policy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5月朱德从抗战前线回到延安, 基于抗战局势及其发展指出: 在这场持久战中, 粮食和各类物质资源将成为决定胜败的巨大砝码^[1]。而此时, 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却对陕甘宁革命区实施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试图将边区军民“困死”在边区^[2]。加上陕甘宁地区连年遭受的自然灾害和大量难民进入^[3]。边区在经济上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难境

地, 8月18日李富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指出: 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800万元, 而支出已达2500万元。中共中央的“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4]。1939年2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号召“通过自己动手, 克服经济困难”^[5]。为解决边区经济困难, 1940年朱德在《新中华报》发表的《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文章中提出了“发展

收稿日期: 2022-12-18

基金项目: 南充市社科联“十四五”规划年度青年项目(NC21C082); 西华师范大学2022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一般项目(exey2022075)。

作者简介: 王安平(1963—), 男, 四川广安人, 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政党政治和党史人物研究。

边区经济建设”的新方略^[6]。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朱德选择将乐天宇团队 1939 年发现的“南泥湾”作为新方略的实践地,提出了南泥湾政策^[7],并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8]。朱德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了他关于区域建设之道的探索。在朱德的指导下,经过 4 年的实践和探索,将渺无人烟、荆棘丛生、野兽群游的荒凉之地,变成了富饶的“陕北好江南”^[9]。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开发了边区经济,巩固了后方,接济了前方,打破了日、伪、顽的经济封锁,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0]。朱德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独特的区域产业发展思想,不仅对陕甘宁地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内容。以“南泥湾政策”的实践为中心,探究朱德关于区域产业发展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的多元产业和优势产业

立足区域的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区域差异,充分发挥区域发展的优势因素,克服发展的限制条件是因地制宜的关键内涵。朱德立足边区的区域优势,积极领导克服实践困境,因地制宜发展边区多元产业和优势产业,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立足边区的优势区位,推动边区多元产业的发展。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约 90 里,是延安县金盆湾的一个乡,有三条河川流经此地,与金盆湾、马坊、镇临、九龙泉等地接壤,纵横一二百里,有宽广平坦的川面,可耕地有一百多万亩,而且土质是松软吸水性强的黄棉地,土壤肥沃^{[11]53-58}。那里有田地,有森林,有丘陵,有水草等,形成了一个适宜生产的气候圈^[12]。曾经人口稠密的富庶之地,却因战乱缘故,人民非死即逃,变成了荆棘遍野、杂草丛生的荒地^{[11]16}。朱德基于“南泥湾”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优势因素,提出并指导实践了旨在通过“军垦屯田”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军粮和军衣问题”的南泥湾政策^{[4]1045},而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践推动了边区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多元产业的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首先,军垦屯田推动农业产业建设。到 1944 年开垦耕地 26.8 万亩耕地,产粮达 10 万多石,实现了“耕一余二”的目标^{[15]120}。同时,农业相关的畜牧业、棉花种植业也得到了大发展,到 1943 年边区养的羊和牛的存栏量较 1942 年分别增加 6 倍和 7

倍,而猪的存栏量较 1940 年增加了 6 倍^{[15]62}。其次,借助棉花种植产业发展纺织业。棉花种植业的成就也非常明显,1944 年 6 月,359 旅种植棉花达 3 098 亩,其中 717 团、718 团、719 团、特务团和旅直团人均种棉花分别达到了 1.181 亩、8.06 亩、1.09 亩、9.88 亩和 2.0 亩^{[15]82-84},而棉花种植业则进一步带动了边区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在农业及相关产业迅速崛起的基础上,朱德积极指导发展多种产业。最后,助推相关多元产业建设。在农业、畜牧业和棉花种植业建设的基础上,推动了边区纺织业、盐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多元产业的发展。例如,1940 年积极推动南泥湾交通运输线路建设,完成了定庆、庆临、延临等六条大路建设,共计两千里^[16]。总而言之,在党中央和朱德的指示下,借助边区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建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盐业和纺织业为重点的边区产业体系,推动了边区多元产业的发展。

第二,直面产业发展区域短板,推动了边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南泥湾虽然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条件和边区部队与人民的强力支持,但是边区农业、畜牧业与相关的棉花种植业等优势产业和盐业与纺织业等边区特色产业的发展,除了面临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外,还面临着流动资金不足、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缺乏、交通不便^[6]等限制性条件,克服区域限制条件是发挥区域优势的重要内容。首先,创新军事战略,解决军事包围。为了解决时刻面临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军事威胁,1941 年 5 月,朱德创造性地提出“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4]1061}的策略,为边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实现了边区生产和防御的“双丰收”。有战士曾回忆说:“1942 年丰收时,敌人又来袭击,企图夺取我们的丰收成果,我部在牛武镇前线,与敌战斗了两天两夜,才将其击退”,边区部队每天“右肩背枪,左肩扛锄”不仅维护了边区军事安全,也保证了边区的产业建设^{[17]4-7},为边区产业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次,广泛动员整合,克服劳动力缺失短板。农业劳动力不足和时空分布不均均是边区产业建设的突出问题,为了解决南泥湾开发缺少劳动力的问题,在党中央指示下,朱德指导对边区农民、部队、机关和学校等农业劳动力进行了再整合,以及对边区难民的合理安置,解决了边区农业、纺织业和盐业产业发展存在的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为边区产业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18]。最后,发展边区贸易,突破边区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封锁,导致边区出入口失衡以及交通不便的问题,朱

德认为缺乏大量的流动资金是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基本困难之一,强调应从边区的食盐和羊毛入手,积极开发边区资源,发展边区的盐业和纺织业,通过发展边区贸易,解决资金困难^[10]。通过实施对外贸易,换取了边区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流动资金。朱德在1940年就提出通过发展边区合作社来发展边区商业^[6],1943年6月20日指导设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人合作社从事边区盐、纺织品、药材等产品输出和军需产品进口,到1944年该合作社的资金达到了2.5亿多元的规模^[19]。

二、以人为本:激发区域产业主体的内生动力

区位因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产业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可以克服产业发展区位因素缺失问题。朱德在陕甘宁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多元主体的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通过思想动员、权益维护和发展环境营造等方式调动产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其参与建设的内生动力。

第一,重视多形式、多层面的思想动员。在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朱德为边区产业建设,“不但苦口婆心,做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9],对边区产业建设相关主体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思想动员,消除了相关主体的思想顾虑,统一了其在边区产业建设中的思想共识。一方面,朱德通过文章阐释和会议强调等形式对相关主体进行思想动员。1940—1944年间朱德在相继公开发表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和《建设革命家务》等相关文章中指出边区农业、盐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在边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其主要策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和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等相关会议中多次重申和强调边区建设的战略意义。同时在开展自上而下的干部动员时围绕相关产业发展提出发展的具体指示,1940年林伯渠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说:“朱总司令最近曾到我们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过,贡献给我们很多宝贵意见”^{[4]989}。另一方面,朱德在不同时期,以身作则,深入基层,并针对不同主体的具体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思想动员工作。例如,359旅在陕甘宁边区开发前期,面对少数战士对“军垦屯田”任务认识模糊、“生产自给”缺乏自信甚至抵触等问题,王震在朱德的指导下,在各级党代表、军代表大会上

对问题系统分析和批判,进而端正同志们的态度,激发了战士们的劳动热情^{[11]53-58},纷纷响应“用劳动的双手,建立革命的家务”的号召^[12]。总而言之,朱德通过思想动员,调动了边区部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等各产业建设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在边区产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24]。

第二,呈现典型、树立榜样,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朱德的指导下,边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以竞赛运动为中心,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发动个人同个人,单位同单位的相互竞赛”^{[4]1126},通过劳动竞赛的形式呈现典型,树立模范,充分调动了边区产业发展实践中多元产业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开展生产竞赛中涌现出了诸如李位、赵占奎、李四等部队劳动英雄^[20]、光华商店、南区合作社^[21]、新华化学厂^[22]等创新主体的榜样。为边区农业、盐业、运输业、工业以及军民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效应^[23]。除此之外,在党中央和朱德的指示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深入群众,以身作则的示范对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践起了重要作用。曾有外国记者地赞叹359旅旅长王震说:“他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1]374}。

第三,强调积极维护多元产业主体政治和经济权益。多元主体参与边区产业和经济建设的行为,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经济性行为。在引导和动员多元产业主体参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积极维护主体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是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激发主体内生动力的根本保障。朱德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积极维护社会各阶层政治和经济权益,建立起了边区产业建设的统一战线。一方面,争取边区上层阶级到边区发展投资,通过组织“参观团”的形式引导士绅^[24]和华侨^[25]参观边区各种建设,引导士绅和华侨参与边区产业建设。同时通过鼓励号召“不通敌”和“不违反政府法令”^[26]的地主回边区收地租,号召地主回乡参与边区产业建设。另一方面,积极维护边区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商人、边区外难民、区内少数民族、妇女等主体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例如,对于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商人不但“准其自由贸易,极力扶助正当的商业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和工人农民一样享受民主的权利”^[27]。同时,通过严厉打击破坏边区民族团结的奸商^[28],维护了边区少数民族的权益和边区的市场秩序,巩固边区产业建设的“统一战线”。同时,针对边区外迁入的难民,边区各地积极

采取针对性的难民安置政策,激发了难民投身边区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407-434}。

三、“多元”协同:建构和完善区域产业体系

构建完善的产业体系是激发相关主体内生动力,充分利用各区域优势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区域产业振兴的必然要求。朱德在构建和完善区域产业体系上,非常重视多元产业主体间的合作共赢和各种产业间的均衡互补。

第一,“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不同主体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同的,但都是不可或缺的,构建和完善区域产业体系需要立足各产业主体的实际,倡导和鼓励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形成产业建设的合力。在陕甘宁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边区各产业的主体主要包括部队、机关、学校、合作社、工厂以及边区居民个体等,朱德积极指导边区通过组织建设和联合生产,形成边区产业建设的合力,主要包括边区内部各主体的组织联合和边区内外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一方面,通过组织建设,推动边区内部产业主体的合作协同。1940年遵照党中央和朱德指示,边区各部队不仅建立了由旅首长、供给部长和各团首长组成的生产委员会,而且各团、营和连等各级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形成了严密的组织领导机制^{[29]3}。1942年,边区政府基于前期建立大规模的“劳动互助组”的实践经验,建立起了为群众所熟知和乐于接受的新的劳动互助组^{[30]167},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31]485}的合作制机制。1944年5月,朱德指出:“各厂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发展”^{[4]1161}。同年6月27日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合作社是生产运动、群众运动最好的组织形式”^{[4]1165},强调要通过合作社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商业贸易实现边区内外各产业主体的合作协同。朱德非常重视通过区域内产业主体与区域外产业主体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1941年11月,朱德指出:要在已有的贸易工作的基础上,更有计划地管理进出口贸易^{[4]1086},进而与边区外产业主体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在党中央和朱德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通过开办商店和合作社,与国统区建立了各种商业贸易关系,不仅将南泥湾地区羊毛、食盐和药材等土特产品换成洋纱、五金、布匹和文具等商品,而且还给边区带来的巨大的资金收益,在1940-1943间通过商业贸易共盈利212 405.7万元^{[15]78}。

第二,“多元”产业间的均衡互补。各种产业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一种产业的缺失或者发展的先天不足,会抑制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一种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则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朱德在探索边区产业建设之道时,强调立足边区经济建设实践和产业发展实际,推动多元产业的均衡协同和互补协同,实现边区产业“多种经营”,并逐步“建立革命家业”^{[32]240}。一方面,立足边区革命和建设需求,推动各产业均衡协同。朱德在领导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非常重视不同产业在边区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强调要根据革命和建设需要突出急需产业在边区产业体系中的比重,1940年,359旅在朱德的指示下提出“农业为主,工业和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33]505-508}的边区产业建设计划,1941年,朱德在给359旅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商业要做,但大小要与农业、工业和运输业配合起来^{[1]16}。而在农业、畜牧业等建设上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之后,在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上的矛盾凸显,朱德指出:重点发展盐和羊毛纺织业,解决资金短缺的困境,同时建立以盐和纺织为中心的工业产业体系^{[4]990}。1943年11月在一次展览会上指出:“今年做到了丰衣足食,明年要做到建立丰衣足食的家务”^{[4]1148},强调要基于已有的基础建立更加均衡完善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立足生产需求,推动各产业互补协同。陕甘宁边区盛产食盐,“仅定边就有几万亩的盐池,不仅产量大、质量好,还易熬制”^{[11]53-58},而边区周围河南、山西等地正在急缺食盐,1940年,朱德曾在会上指示:“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以后经济中心当在定边,请你作长久计划,逐次发展附属工业、贸易、交通等营业”^{[4]1101}。但是受边区自然地理区位和传统落后的盐运业的限制,陕甘宁地区的盐运不出去,面对这情况,朱德明确提出:“要修好通庆阳的大车路及其它的大车路,同时设置转运站、饭店、骡马店,统制出口商店。最后要购足骡马,购足运输工具”^{[33]505-508}。通过发展交通运输业来反推边区的优势和特色产业,进而健全和完善边区产业体系的发展,除此之外,边区棉花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也是边区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三,区域内“多元”融合统一。从区域的范畴来看,区域内各主体和各产业是平等和独立的单元,是多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分别是协同合作和均衡互补的关系,但是从更广的范畴来看,区域内的“多元”是融合统一的整体,各区域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又是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在陕甘宁边区产业建设中后期,其内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逐

步建立和发展, 产业体系也得到逐步完善后。陕甘宁边区很多产业出现了内部无法消耗的产品, 而很多内部必需产品又出现供不应求, 无法满足的问题, 并进一步导致了边区财政问题, 毛泽东指出: 解决边区财经问题, 一要发展经济, 二要平衡进出口^{[5]320}。针对边区进出口失衡问题, 1943年, 朱德指出: 根据边区的条件, 应大力发展盐业的生产和运输, 盐业公司不应取消, 相反各地应大力从各个方面加强。认为边区通过大力发展盐业等优势产业, 可以打破经济封锁, 带动贸易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保障边区政府对资金的需求^{[4]1134}。

四、市场导向: 健全完善区域产业发展机制

以市场为导向, 健全完善产业的发展机制是产业建设并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内容。在产业发展机制的建设中,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朱德基于市场和政府两个关键主体的辩证关系, 提出了在产业发展机制建构中要实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要辩证统一。

第一, 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在边区探索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 朱德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基本原理与边区产业建设实践相结合, 指出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940年9月, 朱德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中指出: “要提高技术, 发展经济, 巩固边区, 供给战争和人民生活需求”^[6], 他认为提高技术, 提高生产能力是发展经济、巩固边区及其产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而发展生产, 建设经济是服务于战争和人们的需求。强调了市场需求是边区产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 朱德还进一步强调边区各产业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及分配都要面向市场, 遵循市场规律。一方面, 边区各产业的建设和产品的生产要以市场为导向, 即各产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1940年, 面对边区盛产食盐, 而河南等周围食盐供不应求“盐荒”等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 朱德明确边区要大力发展盐业, 以此带动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同时, 产业的产品要服务于市场的实际需求, 而不能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1943年3月, 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会议上指出: “工厂必须发展生产, 提高产品质量”^{[4]1126}, 同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 进一步指出“在生产中要改进技术, 提高质量, 不要粗制滥造地追求数量”^{[4]1161}。另一方面, 在产品的分配上以市场为导向。朱德明确反对脱离市场

实际发展规律的平均主义, 1944年4月,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运盐座谈会明确提出“不管技术高低, 要拿同样的工资, 这是平均主义的倾向”^{[4]1161}, 提倡以市场为导向, 要实施“按劳分配”。同时, 朱德强调产业建设要“公私兼顾”, 1943年6月, 朱德指出: “应大力发展盐业的生产和运输, 盐业公司不应取消, 相反地应大力从各方面加强。这是公私两利的事业”^{[4]1134}。1944年4月, 进一步指出: 在边区经济建设中, “建立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4]1158}, 实现公私兼顾。

第二, 注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在陕甘宁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 朱德认为不以“先公后私”为出发点, 不重视从政治上教育生产者, 只强调以工资来刺激生产是边区产业建设和经济建设两种不良倾向之一^{[4]1161}, 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在边区产业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 朱德认为政府的是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的关键。边区的生产秩序不仅受到边区外国民党的侵扰, 同时也受到边区内非法经营主体的扰乱。1940年10月, 朱德在致陈康白的信中指出, 在边区经济建设中, “要防着敌人吃醋, 用兵夺去封锁”^{[4]1001}, “一面防守, 一面生产, 一面训练”是边区产业建设成功的必要保证^{[4]1072}。同时, 推动边区产业建设相关的盐业、土地、税收、金融等相关法规的建设, 并通过鼓励、引导各产业主体遵循相关制度法规, 例如, 鼓励公营商店发挥模范作用^[34]。另一方面, 朱德认为政府要积极作为, 发挥宏观调控的关键性作用。在毛泽东提出边区财政经济面临“出入口不平衡”^{[5]320}矛盾时, 朱德曾指出: 政府要通过解决交通运输和组织奖励出口, 进而增加自由贸易的办法来解决^{[4]1074}, 同年11月, 在出席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各分局局长及光华商店分店经理联席会议上进一步强调: 公营商店要“加强联系, 团结一致”调整和平抑边区内部的市场价格, 服务于边区进出口贸易^{[4]1086}。除此之外, 朱德强调党和政府对边区产业建设实践中的领导作用。1942年8月, 朱德指出: “党的机关、政府机关主要是领导生产”^{[4]1111}。

五、结语

朱德以“南泥湾政策”实践为依托, 积极探索边区产业发展之道的过程中, 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边区产业的发展实际相结合, 探索出了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和市场导向的区域产业发展思想。这些思想对当时建设边区多元产业体系, 推动边区经济建设, 解决边区面临的军衣和军粮问

题,突破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后来的国民经济建设和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深

入学习和借鉴这些宝贵经验,对新时代产业建设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南泥湾续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 [4] 吴殿尧.朱德年谱(新编本)(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M].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
- [6] 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N].新中华报,1940-10-13(1).
- [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 [8] 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 [9] 解放日报.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N].解放日报,1942-12-12(1).
- [10] 王安平.简论朱德的军事经济思想与实践[J].高校理论战线,2004(2):31-33.
- [11] 何亚平.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连载一)[J].中国农垦,2021(2):53-58.
- [12] 肖舟.发现南泥湾的前前后后[J].党史文苑,2000(4):34-37.
- [13]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南泥湾续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15] 王志君.屯垦军魂 抗日时期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解放初期驻疆人民解放军大生产运动纪实[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
- [16] 解放日报社.两千里大车路 大部通车[N].解放日报,1941-05-30(2).
- [17] 吴庭芳.回忆在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J].文史月刊,2004(11):4-7.
- [18]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J].中国农史,2004(1):57-65.
- [19] 解放日报社.设大规模军人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3-06-20(2).
- [20] 冯捷.毛泽东与朱德商讨开发南泥湾[J].中国农垦,2005(1):80-83.
- [21] 解放日报.模范的南区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1-05-25(2).
- [22] 解放日报.新华化学厂实验各种化学用品已有数种试验成功[N].解放日报,1941-05-28(2).
- [23] 高尚斌.朱德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2007(2):84-90.
- [24] 解放日报.士绅参观团返三边[N].解放日报,1941-08-08(2).
- [25] 解放日报.延安华侨联欢会[N].解放日报,1941-08-10(2).
- [26] 新华社苏皖区.在津浦路东联办号召下地主纷纷回乡[N].解放日报,1941-05-27(2).
- [27] 雪松.边区商人如何运用民主?——绥德市选举通讯[N].解放日报,1941-05-16(2).
- [28] 解放日报社.盐池奸商造谣破坏蒙汉团结[N].解放日报,1941-08-06(2).
- [29] 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 [30]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1] 中共西北局研究室.陕甘宁边区组织劳动互助的经验[M].延安:华北书店,1944.
-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3] 金冲及.朱德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4] 解放日报.延安公营商店成立联合会——统一领导执行政府贸易政策,作商民遵行法令之模范[N].解放日报,1941-05-26(2).